脱域乡村情感治理的生成机制研究
——以恩平市黎塘村为例

刘冬莹
（暨南大学）
DOI：10.65285/RWYSHKX.V2I6.007

摘　要：在城镇化与跨国人口流动交织的叙事下，传统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空间脱域。本文以广东省恩平市华侨村落黎塘村为研究个案，考察脱域乡土情感如何被组织并进入村庄公共事务。研究发现，黎塘村以乡亲联谊会为组织载体搭建跨域联络网络，以公共文化项目为纽带推动共同互动与信任培育，以公共空间与集体活动为场景实现身份认同与行动转化，形成“关系组织—情感联结—情感内化”的递进实践路径，将分散的乡土情感转化为捐资建设、返乡参与、公共事务协同等治理动能，打破了乡村治理的在场迷思，证实了情感不仅是润滑科层的策略工具，更是重构跨域乡村秩序的结构性力量，为中国广大流出型乡村的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脱域乡村；情感治理；侨乡治理；跨域联系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Emotional Governance in Disembedded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Litang Village in Enping City

Dongying Liu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intertwined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opulation mobility,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experiencing profound spatial disembedding. Taking Litang Village, an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 in Enping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a cas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disembedded rural emotion is organized and involved in village public affairs. The study shows that Litang Village builds a cross domain contact network relying on hometown association, promotes interaction and trust cultivation through public cultural projects, and realizes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action transformation in public spaces and collective activities. It forms a progressive practical path of relationship organization,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emotional internalization. Scattered rural emotions are transformed into governance motivation such as donation for construction, returning home particip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public affairs. It breaks the myth that rural governance must rely on on site presence. This study proves that emotion is not only a strategic tool to lubricate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but also a structural force to reconstruct cross domain rural order. It provides valuable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outflow villages in China.
Keywords: disembedded village; emotional governance;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governance; cross domain connection

前言

在城镇化与跨国人口流动交织的叙事下，传统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空间脱域。传统乡村治理以属地化社会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和熟人交往为重要基础[1]。然而随着人口流动加剧，中青年主体长期离开村庄，原有日常交往与熟人信任机制逐渐弱化，村庄公共事务由此出现组织主体不足、参与减少和集体行动困难等问题[2]。情感治理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既有研究多以稳定的日常接触为基础，对脱域情境下乡土情感如何获得组织载体、形成关系信任并进入公共事务，关注仍显不足。

为此，本文以广东省恩平市君堂镇黎塘村为研究个案。黎塘村常住人口不足 600 人，旅外乡亲及其后代超过 6000 人，具有明显的跨域人口结构；同时，村庄已形成联系载体，为观察脱域乡村的情感治理提供了具体场景。基于田野访谈、实地观察和相关文本资料，本文考察情感如何通过组织联系、共同事务和持续互动得到维系，并进一步转化为对家乡的认同、责任意识和公共参与，分析脱域乡村情感治理的运作过程及其机制。

一、文献梳理

（一）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

面对人口流动这一社会现实，国内学界展开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其治理视阈经历了一场从“物理空间规训”向“多元主体再造”的深刻演进。

早期的空心化治理带有强烈的工程与规划色彩，呈现出见物不见人的物理治理特征。研究主要围绕土地流转、宅基地规范与物理空间改造展开：一是通过工程技术与土

地流转盘活闲置资源、提高用地效率[3]；二是明确产权关系、规范宅基地审批[4]。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治理逻辑高度依赖基层政府的行政干预与土地置换，村民尚未成为治理的真正主体，难以触及乡村社会秩序解构的深层根源。

随着空心化演进格局的深化，学界的认识逐步超越单一的土地视角，全面转向涵盖经济、组织、文化等维度的多元综合治理。在这一阶段，研究重心实现了三大视角的跃升：一是空间与产业重塑，提出“空间、产业、组织三整合”[5]，并主张的农业产业化与供给侧改革路径[6]；二是社区与组织赋能，强调发挥村“两委”、农村社区以及专业合作组织的协同主体作用[7]；三是文化与价值重构，提出“农民主位”视角，主张通过农村文化建设、重塑责任价值来克服空心化的消极影响[8]。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已将乡村治理的关注点从土地和空间整治拓展至产业发展、组织协同和文化建设，为理解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多维视角。

（二）关于情感治理的研究

情感治理研究为回应上述问题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其关注认同、信任和关系网络在治理中的作用。

情感进入治理视野有长期的思想与管理学渊源。情感被视为人的天生本能，《礼记》即有“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之说[9]。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理性甚至被置于感性的从属地位，认为理性除服务与服从感性之外别无作用[10]。古代思想家对情理的思考多从礼制或哲学角度出发，对理性模式的系统性质疑则要追溯至20世纪初。科学管理学派及其“效率运动”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一味追求效率、忽略人的感受也招致批评[11]。韦伯的科层制是一种理性高效的行政体系，为现代各国政府的体制建设提供参考，但其同样忽略情感因素。

当前，我国学界对情感治理的主流研究大体形成两种指向：将“情感”作为治理目标，或在治理过程中将“情感”作为治理手段。第一类“治理情感”是将“情感”作为治理受体，将心理抚慰作为治理目标，通过情绪安抚、情感慰藉、上门慰问等方式，来消弭治理过程中由于强制性正式权力的使用而对当事人造成的负面情绪影响，或纾解因意外事故、自然灾难对民众造成心理阴影的治理方法[12]；第二类“情感治理”，将“情感”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是指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治理主体将情感因素纳入治理过程，基层工作人员依情治理，“情”治是弥补“正式机制”不足的一种治理手段[13]。

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沿三个方向展开。一是在阻碍因素方面。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居民的社区归属、地方认同与责任感，使情感治理缺少稳定的实践基础[14][15]。二是在实践路径方面。一方面，主张联合地方政治精英与民间力量，建立协商共识机制[16]；另一方面，提出借助网络宣传、大众传媒等手段强化价值传播和社会整合[17]。三是在治理主体方面。一方面关注驻村干部运用情感治理连接国家与社会两端[18]；另一方面关注公安部门通过何种措施有效促进个人与政府的情感嵌入融合[19]。

（三）侨乡治理的研究

现有关于侨乡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华侨资源投入、跨域资源动员和多元主体参与展开，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华侨参与家乡建设的资源基础、组织条件及其关系影响。

第一，资源供给维度。侨汇、投资和公益捐赠长期构成侨乡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来源。华侨投入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意义：资金改善了村庄的物质条件，捐赠行为也表达了华侨对祖籍地的情感联系和身份责任[20]。

第二，组织中介维度。受空间距离与信息差制约，海外捐赠意愿需经过项目对接、信任建立、事务协调等环节才能转化为落地行动。村干部、侨领和乡贤凭借地方身份、社会声望及跨域关系，在村庄需求与外部资源之间发挥衔接作用[21][22]。行政资源、经济能力、地方知识和社会声望之间的互补，是多元主体参与村庄建设的重要条件[23]。

第三，主体互动维度。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资源基础和参与方式，对建设项目的内容、用途和意义可能形成不同判断。人口流动扩大了村庄成员之间的差异，跨域资源的进入也会影响村庄内部原有的关系结构与主体位置[24]。同时，华侨参与的持续性受代际联系减弱和关键人物依赖影响，新生代与祖籍地联系趋弱，核心人物变动可能导致资源动员中断[25]。

（四）文献评述

以上三类研究分别从结构背景、治理方式和资源参与三个方面，为理解脱域乡村情感治理提供了研究基础，但三者之间尚未形成完整的解释链条。人口流动研究揭示了乡村成员与村庄物理空间分离后产生的主体缺场，却较少说明跨域成员如何重新进入村庄治理；情感治理研究关注认同、信任和关系在治理中的作用，但分析场景多建立在稳定的日常接触之上；侨乡治理研究则主要讨论华侨资源、组织中介和主体合作，乡土情感多被视为参与动机，较少被视为一个需要持续组织、维系并转化的治理过程。由此，成员长期处于村庄之外时，乡土情感如何获得组织载体、如何在共同事务中形成关系信任，并进一步转化为公共参与，仍有待深入分析。

基于这一问题，本文将情感治理视角延伸至脱域侨乡情境，考察黎塘村如何维持跨域乡亲联系并推动公共参与。第一，关系组织，关注如何连接分散各地的乡亲，为跨域联系提供稳定的组织载体。第二，情感联结，关注乡亲如何围绕共同事务展开持续互动，并在共同做事的过程中增加熟悉感、信任感和对家乡的情感。第三，情感内化，关注共同参与形成的乡情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对身份的认同和对村庄事务的责任意识，并表现为持续的公共行动。

二、案例及研究方法

（一）案例概况

本研究选取广东省恩平市君堂镇黎塘村作为研究案例。黎塘村下辖11个自然村，村域面积约5.25平方公里，其中

10 个自然村以张姓村民为主，长湾村以陈姓村民为主，不同自然村具有不同的宗族源流和历史脉络。截至田野调查期，全村常住人口不足 600 人，且老龄化程度较高；旅外乡亲及其后代规模超过 6000 人，主要分布于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委内瑞拉以及港澳地区，村庄成员呈现明显的跨域分布特征。

黎塘村具有较为深厚的侨乡历史。近代以来，村民依托宗族和同乡关系迁往港澳、东南亚、美洲等地，并通过侨汇、返乡建房和公益捐赠等方式参与家乡建设。村内现存 37 座华侨出资兴建的碉楼，历史上还曾集资修建公路、成立汽车客运公司、接通电话线路和创办侨刊，形成了跨域乡亲参与家乡事务的历史基础。进入新时期，黎塘村于 2013 年成立乡亲联谊会，通过走访联谊、社群联系、节日问候和资金筹集等方式维系海内外乡亲关系。2015 年前后，联谊会牵头推动碉楼文化广场建设，并通过乡亲捐资和功德碑留名组织跨域参与；村委会与乡贤随后共同建设村史馆、张瑞芬纪念馆，实施碉楼亮灯工程和环村路建设，持续推进侨乡文化与公共设施建设。近年来，黎塘村还被纳入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建设名录。

黎塘村适合作为观察脱域乡村情感治理的案例，主要在于其同时呈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人口长期跨域流动，乡亲联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村庄又形成了乡亲联谊会和公共文化项目等组织与实践载体。由此，黎塘村为分析乡土情感如何通过组织联系、共同事务和持续参与进入村庄公共治理，提供了较为连续的经验材料。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综合运用文献调查、文本分析、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等质性方法。通过查阅地方志、村史、族谱、侨乡资料、乡亲联谊会材料及公共项目资料，梳理黎塘村的建村历史、华侨迁移和公共建设过程；通过观察文化广场、村史馆、张瑞芬纪念馆和功德碑，了解相关设施的建设与使用情况。围绕乡亲联谊会运作、跨域联系、项目筹资和村民参与等问题，对村干部、联谊会参与者、自然村负责人、乡贤和普通村民开展访谈，并结合项目宣传材料进行文本分析，交叉印证相关资料，以考察乡土情感如何通过组织联系和公共项目进入村庄公共事务。

三、案例分析：黎塘村跨域情感治理实践

（一）关系组织：乡亲联谊会连接跨域乡亲

2013 年成立的黎塘乡亲联谊会，是黎塘村联系海内外乡亲的重要组织载体。根据联谊会章程，其主要具有联谊、公益和联系乡亲等功能，服务对象也不局限于村庄常住人口，而是包括居住在港澳、海外和外地的黎塘乡亲。联谊会由此将分散于不同地域的乡亲纳入同一组织联系范围，为跨域成员继续参与家乡事务提供了固定的组织入口。

联谊会首先承担跨域联络功能。日常运作中，联谊会通过电话、微信群、节日问候、走访拜访和返乡联谊等方式，向外地乡亲传递村庄信息，了解乡亲需求，维持海内外成员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对于长期不在村庄生活的成员而言，这些联系使其能够持续了解村庄建设、乡亲生活和公共活动。

其次，联谊会承担乡亲互助和公益服务功能。其设定章程将扶贫济困、敬老助学、公益慈善和协助村级组织开展工作等内容纳入联谊会职责。通过成员联系和资金筹集慰问村内困难家庭，帮助处理乡亲之间的互助事务。

再次，联谊会承担村庄组织与跨域乡亲之间的协调功能。在公共建设和村庄活动中，联谊会负责传递项目信息、联络外地乡亲、发布倡议、组织走访，并将乡亲的意见和资源反馈给村庄组织。村委会和联谊会由此形成分工：村级组织负责提出和推进村庄事务，联谊会负责联系不在村乡亲、解释项目意义并协调外部参与。

总体来看，乡亲联谊会将原本分散于家庭、亲属和私人交往中的乡亲联系，转化为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公共联系，为后续公共项目筹建和乡亲参与村庄建设提供了组织基础。

（二）情感联结：在持续互动中培育信任关系

乡亲联谊会成立后，黎塘村通过共同推进村庄事务，使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乡亲获得持续互动的机会。2015 年前后，联谊会与村委会、乡贤及各自然村负责人共同筹建碉楼文化广场。项目启动后，联谊会先在微信群发布倡议，乡贤和自然村负责人分头联系本村外出乡亲，重点联络海外和港澳熟识乡亲。围绕选址、建设内容、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度，乡亲们在群内讨论、电话交换意见，海外乡亲因时差常在夜间参与，联谊会次日整理意见并逐一回应，形成“发布—讨论—反馈—再沟通”的持续互动。

筹资并非一次性完成。乡贤和热心乡亲先行捐款后，联谊会公布捐资名单和项目进展，形成示范；再按宗族、片区和熟人关系分工，逐一电话联系其他乡亲。对海外、港澳乡亲，则通过微信语音、视频或委托国内亲属转达信息，对方回应后及时致谢。据材料，项目共筹集资金 230 余万元。筹资期间，联谊会定期反馈资金明细和工程照片，乡亲通过点赞、留言、转发倡议和提出建议继续参与。功德碑刻名时，联谊会与捐资者反复确认姓名排序并拍照发送，使捐资者看到自己的投入被村庄记住。

除筹资外，乡亲还参与村史馆和张瑞芬纪念馆资料收集。联谊会通过微信群发布征集启事，海外乡亲发回老照片、族谱扫描件和华侨迁移记录，或口述家族历史由国内亲属记录整理；信息有出入时，联谊会与提供者多次沟通核实。返乡期间，乡亲参观展馆、参加村庄活动并相互见面。春节、清明等返乡节点，联谊会组织茶话会、祭祖或聚餐，乡亲们交流近况、互换联系方式，并现场讨论村庄下一步建设。

这些共同做事的过程，使乡亲联系从一般性问候转向具体事务协作。乡亲需要相互传递信息、回应建设进度、协调捐资和提供资料，彼此熟悉程度由此增加；联谊会对项目进展的持续反馈，也使乡亲逐渐形成对组织者和村庄事务的信任。共同筹资、提供史料和参加返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乡亲对家乡历史和现实变化的关注，乡情由个人

记忆转化为可在互动中反复确认的关系感受。

（三）情感内化：推动乡情认同转化为持续公共参与

在黎塘村的实践中，乡亲情感进一步进入村庄日常生活，并在公共环境、村庄交往和身份认同等方面体现出治理成效。

首先，公共项目改善了村庄的人居环境。文化广场为村民提供了休闲、活动和交往场所，碉楼亮灯工程提升了村庄夜间环境和侨乡景观，村史馆与张瑞芬纪念馆则使村庄历史获得了集中展示的空间。这些建设既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也使乡亲捐资和参与形成了可以被村庄成员共同感知的建设成果。

其次，公共空间和集体活动增加了不同自然村之间的交往。村民可以在广场休闲、参加活动和观看演出，返乡乡亲也能够借助节庆活动、联谊活动和参观展馆与在地村民见面。原本分散于不同自然村、不同地区的乡亲，由此获得了共同活动和相互认识的机会。持续性的公共交往扩大了乡亲之间的接触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自然村之间的疏离，增强了村庄内部的协调与和谐。

最后，乡情逐渐转化为对“黎塘人”身份的认同和对村庄事务的责任感。乡亲通过捐资、提供史料、返乡参加活动和支持公共建设，不仅表达了对家乡的感情，也逐渐形成了“黎塘人的事情需要共同关心”的行动意识。对一些乡亲而言，为村庄建设出力、帮助困难乡亲、支持公共项目，成为维护“黎塘人”身份的重要方式。乡亲认同因此不再停留在血缘、籍贯或故土记忆层面，而是表现为持续捐助、返乡参与、互助和支持村庄发展的具体行动。

四、深层机制讨论：情感治理的生成逻辑

（一）认同生产：从“身心离散”到“情感共同体”

脱域情境下，乡村认同生产的关键，在于将以共同居住为基础的地理成员资格，转化为能够跨越空间持续发挥作用的关系身份。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个人属性，而是在社会互动、关系确认和意义归属中不断形成的过程[26]。情感治理由此通过“乡亲”这一关系称谓，重新界定村庄成员的范围，将家庭来源、地方记忆、亲属联系和故土情感纳入成员身份，使居住在海外、港澳和外地的成员仍能被纳入村庄关系之中。跨域成员的参与资格不再完全取决于是否长期居住在村庄，而建立在其与黎塘之间持续存在的关系联系之上。

这种认同不会因身份命名自动形成，而需要在持续互动和公共参与中反复确认。黎塘村的乡亲联络、返乡活动和公共事务参与，使“黎塘乡亲”从一种称谓转化为可以被实践的关系身份。成员在回应村庄事务、参与乡亲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家乡事务与我有关”的参与预期，乡土认同也由此获得行动内容。认同生产的作用正在于为脱域成员提供稳定的情感归属，并使其与村庄公共事务建立联系。不过，这一机制依赖黎塘村长期积累的迁移历史、侨乡记忆和乡亲交往基础。联谊会和公共项目能够激活既有认同，却难以在缺少历史联系的条件下凭空制造稳定的乡土归属。

（二）权力运作：从“刚性行政”到“柔性动员”

跨域情境下，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不只是行政信息能否传达到位，更在于公共事务能否被长期生活在村庄之外的乡亲理解为与自身有关的事情。黎塘村通过乡亲身份和关系网络，对公共事务进行情感化转译，将村庄建设、公益互助等事项纳入回馈家乡、照应乡亲和延续地方关系的意义框架之中。乡亲联谊会及其核心联络者由此承担了连接正式组织与跨域成员的中介功能，使行政组织提出的公共诉求能够进入熟人关系和乡亲交往之中，成员的参与也获得了超出制度服从之外的情感理由。

这种柔性动员改变了治理意志的传递方式。面对长期生活在村外的成员，村级组织难以依靠行政命令实现直接动员，实际行动更多依靠项目说明、熟人联络、乡贤带头、意见反馈和捐资确认等方式逐步推进。其作用不在于替代正式组织，而在于降低正式治理进入跨域关系网络的沟通成本，使公共项目能够在信息传递、意见协调和资源筹集之间持续推进。这一方式具有明显的关系依赖性，核心人物的个人声望和联络能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柔性动员能够增强公共事务的可接受性，但其长期运行仍需要村级组织明确责任边界、公开项目规则并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

（三）资本转化：从“私人资本”到“公共治理效能”

侨乡的经济资源和乡亲网络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资源，其作用方向取决于是否有公共项目承接，以及个人投入能否获得共同认可。黎塘村通过碉楼文化广场、村史馆和纪念馆等项目，将乡亲的资金、关系和情感投入引向面向全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功德碑和捐资留名则将个人捐资转化为可见、可记忆的公共贡献，使捐资者获得与家乡持续联系的象征位置。私人资源在乡情网络和组织化互动中可以被动员到村庄公共事务之中，并通过公共事业、返乡联谊和日常交往产生公共效应[27]。

这种资源转化依赖三个条件：公共项目具有各自然村能够共同认可的地方意义，荣誉机制能够确认乡亲的参与，联谊会和村级组织能够提供稳定的资源承接渠道。条件不足时，跨域资源仍可能停留在家庭、祖屋或小范围宗族事务之中。因此，黎塘村的情感治理并未消除乡情资源的私人属性，而是通过公共项目和组织联系拓展了其作用范围，使私人投入具备了进入村庄公共事务的渠道。

结语：

本文以广东省恩平市黎塘村为个案，探讨脱域乡村中乡土情感如何被组织化并嵌入公共事务的过程。研究表明，人口跨域流动并未必然切断乡村成员与家乡的联结，但乡土情感无法天然发挥治理效能，需依托具体的组织载体与实践路径转化为治理资源。黎塘村以乡亲联谊会搭建跨域持续联络网络，以公共文化项目引导私人乡情向公共事务转化，以文化广场、村史馆、纪念场馆与集体活动为场景，实现了跨域参与的持续落地。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一是单一村落个案的特殊性较强，结论难以直接推广至其他类型的人口流出村；二是对海外乡亲、年轻群体及未参与者的一手资料不足，代际与参与度差异的分析有待深化；三是缺乏长期量化数据支撑，相关讨论侧重机制阐释，无法替代治理绩效的直接测量。未来可通过多案例比较与跨域成员追踪研究，进一步检验脱域乡村情感治理的适用条件与作用边界。

参考文献：

[1] 陈柏峰 . 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 [J]. 社会 ,2011,31(01):223−241.

[2] 王亚华 , 高瑞 , 孟庆国 . 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02):23−29.

[3] 王介勇 , 刘彦随 , 陈玉福 . 黄淮海平原农区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 地理科学 ,2012,32(12):1452−1458.

[4] 刘孟山 . 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稳步治理空心村问题 [J]. 管理现代化 ,2007(02):4−6.

[5] 杨忍 , 刘彦随 , 陈秧分 . 中国农村空心化综合测度与分区 [J]. 地理研究 ,2012,31(09):1697−1706.

[6] 刘永飞 , 徐孝昶 , 许佳君 . 断裂与重构 : 农村的“空心化”到“产业化”[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14(03):16−22.

[7] 芦晓春 , 李兴佐 , 刘林 , 等 . 村庄权力结构视角下的“空心村”整治研究 [J]. 安徽农业科学 ,2011,39(05):3115−3117.

[8] 刘锐 , 阳云云 . 空心村问题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 [J]. 社会科学研究 ,2013(03):102−108.

[9][春秋] 孔子 . 礼记 [M]. 胡平生 , 张萌 , 译 .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7.p:432.

[10][英] 休谟 . 人性论 [M]. 关文运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96.p:451.

[11] 周三多 . 管理学 [M].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p:17

[12] 何雪松 . 情感治理 : 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 [J]. 探索与争鸣 ,2016(11):40−42.

[13] 刘太刚 , 向昉 .“以规治情”与“以情治情”: 社区情感治理的再认识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6):11−18.

[14] 朱楷文 , 王永益 . 情感“回归”: 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J]. 学海 ,2021(6):32−39.

[15] 高飞 . 梯度情感动员的双重过程 :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递进逻辑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4):55−62.

[16] 蓝煜昕 , 林顺浩 . 乡情治理 : 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 : 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2):54−59.

[17] 陈华明 , 孙艺嘉 . 情感线逻辑下的网络舆情生发演化机理与治理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20,41(5):157−163.

[18] 向德平 , 向凯 . 情感治理 : 驻村帮扶如何连接国家与社会 [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84−93.

[19] 汪勇 , 周延东 . 情感治理 : 枫桥经验的传统起源与现代应用 [J]. 公安学研究 ,2018,1(3):99−123.

[20] 唐劼 , 叶孝奇 . 侨乡地区传统村落乡村振兴策略研究 [J]. 城市环境设计 ,2023(06):332−338.

[21] 陈凤兰 . 华侨村官与侨乡社会治理资源的跨国动员 —— 以福建省明溪县为例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7(01):19−28.

[22] 袁方成 , 周韦龙 . 从振兴共同体到共同体振兴：乡村振兴的乡贤逻辑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02):101−109.

[23] 胡炎平 , 姜庆志 , 谭海波 .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村多元精英合作治理——以江门市农村联谊会为考察对象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08):73−77.

[24] 王晓 , 李鸿阶 . 乡村振兴背景下侨乡异质性社会治理考察 [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1):191−200.

[25] 曾书林 . 华侨新生代参与侨乡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D]. 南昌 :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26]Jenkins R. Categorization: Identity, Social Process and Epistemology[J]. Current Sociology, 2000, 48(3):7−25.

[27] 胡鹏辉 , 高继波 . 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17(01):20−29.

作者简介：刘冬莹（2002 年 3 月 − ）、女、汉族、河南平顶山、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治理。